

大众新闻
客户端大众日报
微信

考古研究已40年

广饶县在8000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处于泰沂山北麓山前冲积平原和黄河冲淤积平原交接地带的这块土地，正是因“地势广大平坦，饶沃宜农”而得名“广饶”。广饶傅家遗址东西长750米，南北宽500米，总面积37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层厚约3米，内涵丰富。自1985年至199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所、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先后多次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揭露面积707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508座，灰坑214个，水井4眼，出土石器、骨器、角器、陈器、玉器等各类文物400余件。2006年，傅家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发现的双人叠葬墓和开颅手术实例，在同类遗址中罕见。在392号墓中，发现墓主颅骨右侧顶骨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25毫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推测墓主生前曾施行过开颅手术，且术后长时间存活。有研究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

对傅家遗址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是在2021年。当时，为配合广饶潍南路以北傅家片区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东北部和北部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此次发掘墓葬58座，其中大汶口文化墓葬38座，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室小且无葬具，头向以东北者较多。葬俗以单人葬为主，存在大量仅存头骨或者仅下肢骨齐全而上肢骨缺失的现象。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多数没有随葬品，有者数量也较少且残缺。此外，还发掘了金元墓葬11座，明代墓葬4座，清代墓葬6座。

傅家遗址虽然已被多次发掘，但与37万平方米的总面积相比，目前所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可见该遗址分量的不一般。有研究者认为，傅家遗址可能代表了鲁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它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地方类型和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也为深入探讨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广饶傅家遗址还藏着多少秘密

我国科学家凭分子遗传学证据确认，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距今4750年以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态。这项研究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等联合开展，相关论文近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随即冲上热搜。那么，实证母系社会的傅家遗址，还藏着多少秘密呢？

「非典型」大汶口文化

□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从已知情况看，傅家遗址透露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

傅家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从发掘情况看，它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傅家遗址自身有37万平方米，中心部分有18万平方米。与之相连的还有荣庄遗址和五村遗址，荣庄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五村遗址总面积7.5万平方米。此外，广饶的西辛遗址和寨村北岭遗址也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遗存。由此可知，当时这片土地适宜人类居住，聚落比较密集。傅家遗址发现水井的数量较多，是大汶口文化诸遗址中比较少见的。水井的发现，意味着傅家先民可能习惯饮用地下水。这或许与傅家遗址靠近当时的海岸线，当地土质为滨海盐碱性土有关，因为地表水不适合饮用。

傅家先民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年—4600年，除山东外，在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区也有分布。鲁南大汶口文化遗址里常见的觚、鬲、背壶、孟、高柄杯、漏器等，在傅家遗址群很少见到或者没有。陶器、C型豆形杯则是傅家遗址聚落群所特有的。此外，鲁南流行的镂空装饰在傅家遗址群落很少见，但在鲁南新趋势微的彩陶，在此地却有较好的发展。整体来说，傅家遗址的制作工艺比较粗糙，发展水平与同时期山东先民相比较为落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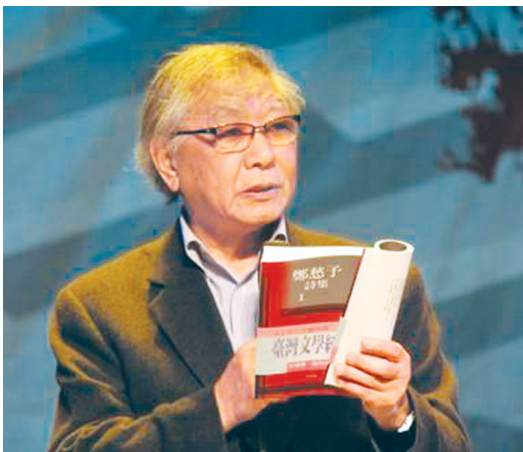
傅家先民贫富差距不明显。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作为黄河中游大汶口文化代表类型的仰韶文化，墓葬已经出现完整的分区甚至分组的现象，墓葬形制和陪葬品悬殊，凸显氏族组织结构和等级分化。汶泗大汶口文化墓葬也已经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分化。但是从五村和傅家遗址墓葬发掘情况来看，随葬品极少，几乎看不出差别。

利用古DNA研究傅家遗址并非首次。此前，山东大学学者董豫、李丰实曾撰文《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形态的思考——来自DNA和稳定同位素的证据》，发表于2017年第7期的顶级学术期刊《考古》上。团队对傅家遗址23座墓葬的古DNA情况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在90%的情况下该遗址至少有300人都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序列。也就是说90%的概率下傅家遗址是母系氏族。同时，傅家墓地发现的男性个体应该都是该母系氏族的成员，并不是入赘的女婿。也就是说，至少在丧葬习俗上，相比于血缘关系，婚姻纽带关系是被弱化的。

上述文章还指出，大汶口文化晚期不同遗址的社会分化程度不同，有些遗址贫富差距明显，如大汶口遗址、野店遗址、西夏侯遗址、陵阳河遗址等。而有些遗址则较为平等，如傅家遗址、五村遗址等。“我们可以想象不同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也有差别，包括继嗣关系、婚姻关系等。通过了解大汶口文化其他遗址以及时代更晚一些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我们才可能认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发生了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并进一步探讨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对于傅家遗址的讨论还将延续。在傅家遗址群落周围，已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营子、钟家、西杜疃等遗址，这些遗址可以视作傅家遗址文化的发展。傅家遗址的先民也许不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居民，但是，傅家遗址却向我们传递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的信息，并为区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乡愁就背在我的背包里



□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

中国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6月13日凌晨（美国当地时间）辞世，终年92岁。郑愁予1933年出生，他在自我简介中称：“生于山东济南，远祖迁自闽台，为明末暨有清一代世袭军事家庭。”郑愁予的很多诗歌写祖国山河、无尽乡思，其诗歌集婉约、豪放、侠义等于一体，有着浓郁的东方古典色彩。

郑愁予的人生经历很是曲折，在济南出生后，三四岁就跟随做军人的父亲辗转各地。他说，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非常漂泊，在山东、北京、江苏、湖北、湖南、河北等多个地方生活过。15-16岁，郑愁予随家人从北京去往南京，辗转武汉、衡阳、桂林、广州等地，于1949年到达中国台湾。

在接受不同采访时，郑愁予都曾透露，小的时候，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济发”。郑愁予在《可凡倾听》节目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小名：“济发的意思是济南出生。他（父亲）是军人，我一出生他就出发了，有任务。”

“济发”这个名字，是对郑愁予和其家庭颠沛流离生活的写照。郑愁予说：“济南的济，就是济水，成就了一座名城名城。我以前不喜欢我的小名‘济发’，现在不仅喜欢，而且深爱，遗憾的是现在没有人叫我的小名了。”

郑愁予是笔名，其原名是郑文韬。谈及自己的笔名，郑愁予称，18岁发表诗歌《老水手》时，首次署名郑愁予。这个名字来自他极爱的《九歌》，他认为《九歌》之《湘夫人》中最动人的句子就是“目眇眇兮愁予”，后来又读到辛弃疾的“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便觉得“郑愁予”最合适作自己的笔名。

2005年，旅居海外近四十载的郑愁予最终落籍金门，回到了其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与中国大陆咫尺相望。郑愁予称：“到那儿去，非常有我的远祖故乡的感觉。”

谈及如何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郑愁予称，15岁时，他参加北京大学针对中学生举办的一个暑期文艺营，在著名的北大红楼，接受了诗歌创作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郑愁予认为，这是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事，他由此开始跨进诗歌的领域。

郑愁予写的第一首诗叫《矿工》，源自他和同学到北京西部门头沟煤矿参观的经历。当时，郑愁予看到一群孩子在矿口上玩耍，就问他们为何在这里玩，孩子们回答在等爸爸出来。一听这句话，郑愁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连孩子也知道矿坑是很危险的地方。他同情矿工，写下“当你生下来，上帝就在你手上画了十字架”。十字架是劳动者的铁锹，是劳动者的命运。这首诗拿给文艺营的老师，老师对他说：“很了不起，你的诗里有人道主义精神。”

师长的鼓励给了郑愁予很大的信心，激发了这个少年的诗心。在一路南下漂泊的日子里，郑愁予坚持写诗，给《武汉时报》等报刊投稿，刊发《爬上汉口》《草鞋与筏子》等诗歌。1949年5月，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草鞋与筏子》。

郑愁予被读者熟悉的诗歌有《错误》《水手刀》《残堡》《小小的岛》《如雾起时》等。其中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歌，被罗大佑、李泰祥等音乐人谱曲演唱，比如，罗大佑演唱的《错误》，李泰祥谱曲的《边界酒店》《牧羊女》《雨丝》《旅程》《天雷》等。

在郑愁予的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思念家乡之作。他的足迹踏过济南、北京、武汉等地，他诗歌中日夜思念的故乡却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或城市，而是从塞北到江南，从“燕云”到海上的广阔的祖国大地。

郑愁予书写乡思的《边塞组曲》，包括《残堡》《野店》《牧羊女》等六首。他借助这些诗歌，抒发自己追逐梦想、壮志未酬等情感。比如，《残堡》写一个悲感的将士的孤独感：“一切都老了/一切都抹上风沙的锈/百年前英雄系马的地方/百年前壮士磨剑的地方/这儿我黯然地卸了鞍/历史的锁啊没有钥匙/我的行囊也没有剑……”郑愁予书写燕赵大地人文历史的《燕云集》组诗，以及《湘西行》组诗、《错误》等诗歌，也寄托着“游子”的思乡之情，呈现着诗人对祖国壮阔山河的深厚情感。就如：“我平生何曾领略过/这种魂出窍的惊悚”“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离愁、怀乡是郑愁予诗歌的重要主题。郑愁予刚到美国不久，面对美国中部肥沃的土地，想到的是祖国，他向着祖国的方向跪在地上，写下一篇长诗《我在温暖的土壤上跪出两个窝》——“黑土啊/我捧起一捧/紧握/像在梦里握住/远方亲人的手……”当时的他心里想着中国的大地，期盼祖国大地有朝一日也变得更加肥沃。

郑愁予说：“我走过很多地方，乡愁就背在我的背包里。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故乡。这个乡愁就是我的民族、我的国家。乡愁告诉我，我应该做的事情。”



考古学的“第二次革命”有多牛

□ 张九龙

日前，我国科学家凭分子遗传学证据确认，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距今4750年以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态。这项成果首次以分子遗传学证据实证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具体结构，刷新了母系社会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铁器时代的遗传学线索溯源。

消息一出，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惊奇发现，考古不仅是“挖挖土”，还可以充满科技范儿。实际上，科技考古早已是考古学的标配，现代考古学已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含大量自然科学方法的交叉性学科。这次立功的是其中一个细小而重要的分支：分子考古学。

古DNA里信息多

世界各地不断有古代人类遗骸的重大发现，引起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的思考：人类何时何地从古猿变来？世界的各色人种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技术革新的现代人，祖先究竟出自哪里？各民族、民族之间的亲疏远近究竟是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分子考古学能派上大用场。

分子考古学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出土的古代任何可研究对象进行分子水平上的考古研究。分子考古学的核心是古DNA研究，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提取和分析保存在古代人类和动植物遗骸中的古

DNA分子去解决考古学问题。

分子考古学是考古学与遗传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遗传学告诉我们，生物基因组里包含一个物种在历史长河中的所有遗传信息。人类基因组约有20000个基因，全球范围内，这些基因的结构几乎相同。尽管如此，人类基因组中仍然有数百万个变异，这些变异可以帮助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祖先差异。1984年，《自然》杂志刊发19世纪末灭绝的斑驴标本DNA提取报告，可作为古DNA研究兴起的标志。

我们知道，生物死亡之后，原有DNA分子结构会受到严重的化学和物理损伤。所以在古遗骸中提取出的古DNA，往往会严重降解，这就给古DNA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不过，近年来随着技术持续突破，研究人员已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实现对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

考古学者、吉林大学教授朱泓指出，几十年来，对地下出土的古人骨进行DNA提取扩增测序和分析，是国际考古学界前沿课题和热点课题。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丰硕。2000年，研究人员就对淄博市临淄区古墓群中的古人类和现代人样本进行了DNA提取、纯化，并完成同一地区三个不同历史年代的人类群体的DNA序列及其数理统计分析，从而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人群的分布及遗传结构与现代人的异同。

这次对于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团队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

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科研人员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为摩尔根、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是文明前夜重要阶段”的理论提供了关键的东方证据。

应用空间很广阔

除了实证母系氏族，分子考古学还有广阔的应用之地。

通过分子考古学，科学家能追溯人类的基因来源，揭示人类不同种群的迁徙路径。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和现存人群的DNA，科学家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推测古代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

通过分子考古学，可以揭示文化、技术和人群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弄清技术、文化是如何传播的。例如对河西走廊的古代基因组分析，揭示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一次显著遗传成分转变，证明了“张骞凿空”及汉代大规模移民政策，对区域文化和遗传结构的深远影响。

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人员能够解析古代人类的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例如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汉代戍卒主要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同时发展高效的牧业，以应对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条件。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牲

畜利用度高，羊、牛、马不仅是食物来源，更被用作畜力以增强军事后勤保障能力。这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细节。

分子考古学在古病理学领域的应用也十分重要。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体遗传信息，研究人员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传播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团队曾研究河西走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混血的遗传数据，揭示出与人群迁徙相关的疾病传播模式，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

正因如此，分子考古学是现代考古学上一次重要的技术进步，被誉为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从人类起源到社会结构，从基因演化到疾病传播，分子考古学正逐步解锁人类历史的复杂面貌。展望未来，通过跨学科合作、技术创新、伦理思考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等，分子考古学有望发展成为更加成熟和多元化的学科，为我们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历史画卷。”文少卿认为。